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中國戰場

王振德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

(新排本)

王振德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25 印张 262 千字

印数 0001—2000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226-0/D. 41 定价:11.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绪 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式签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到现在整整50年了。

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使世界避免了法西斯暴政的统治，有力地促进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浪潮，空前高涨，旧的殖民体制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先后诞生了几十个独立民主的新国家，形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第三世界”。原来处于法西斯暴政统治之下的德、意、日等各国人民，也重新获得了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胜利。五十年来，各国政治家以及有关学者十分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热经久不衰，是不难理解的。

各国有关二战史的著作，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但是，除少数作品外，却存在着某些不足。作者往往囿于某种成见，不能从宏观上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如实地把它看成一个事物的有机整体，进行考察；过分地强调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独特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些学者无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有关各国军民共同斗争的结果。他们往往怀有历史成见，否定弱小国家，特别是忽视中国战场在大战中的应有地位和贡献。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他们著作的科学性。

中国反法西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首先揭开了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开劈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六年的局部战斗，八年的长期抗战，迫使日本战争开支过大，既无力研究与提高武器

的质量,也无力扩建和充实军队的装备;经济失调,生产混乱,人员大量伤亡,劳动力严重不足,自 1939 年起,日本国力已经开始下降。沉重的战争负担,迫使日本一切军政施策,均以解决侵华战争为中心。日本无力在 1940 年,乘希特勒闪击西欧之机而“南进”;也无法乘莫斯科吃紧而执行“北进国策”;更无力在太平洋初战得逞之际,侵占澳洲,冲向印度洋,进攻中东,与德军相呼应。德意日三国军事条约形同废纸,始终未能组成一个军事实体。同盟国既无东顾之忧,顺利地执行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取得大战的完全胜利。忽视中国战场的研究,低估中国战场在大战中的战略地位,不可能写出科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中国史学家对中国战场早有清醒的认识。在五十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以 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为起点。1978 年以来,中国学者,着眼于世界,破除成见,实事求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论文,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近年来中国二战史学界已经比较注意到中国战场的研究,还有人把中国战场的国际地位问题,拿到国外去讲,这是好事。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外学者对中国战场的认识依然存在着很大分歧。时至今日,外国学者姑且勿论,我们中国还有人照抄所谓“成说”,宣称: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战争的开始,……主要表现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侵略反侵略战争”,易言之,中国抗战开始时,还不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成了“六年战争”了。遗憾的是,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我国还占有主导地位。目前,美国学术界正在讨论,在学校教学中,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错误倾向问题。我们亚洲人,中国学者,不宜静候西方国家学术界,摆脱“西方中心论”之后,再视为“成说”,跟着学。

科研工作的缺点,必然影响到一般史学著作。例如,颇具权威性的《世界历史》(全一册,青年读物,1990 年版),专列一章“第二

次世界大战”，其中对中国反法西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一字未提。不难看出，中国战场是否是二次大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二战中到底有何战略地位？关于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在中外史学界，意见分歧是鲜明的，深刻的。

纵观国内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科研状况，其基本缺点是，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始至终是一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忽视中国战场的战斗史实及其在二战中的战略地位。这不仅抹煞了中国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的伟大贡献，也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科学体系的确立。

但是，史实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深信，根据中外大量史料，遵循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发扬我国历史学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不唯上，不唯书，不任人方圆，不阿顺苟同；努力探索，锲而不舍，中国史学家完全有能力作出与我国对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贡献相称的科研成果。两千万中华儿女用鲜血凝成的胜利丰碑必将矗立于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科学体系，必将日臻完善。笔者不揣冒昧，竭尽绵薄，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一书修订出版，即试图弥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科研中的基本缺点于万一。但愿它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专著问世，把问题尽早解决。让人们了解，中华民族不仅在古代有四大发明，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事业，在现代，中华民族为了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捍卫人类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也做出了伟大贡献。

中国战场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已故所长刘思慕教授倡议下进行的；并曾得到陈鼎文同志的鼓励和帮助。在编写过程中，吕永和、王德中、王伟敏等同志提供了重要资料；马晓光、侯成德、杜文棠、刘陵、颜玉强等同志共同探讨了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有关同志，黄玉章教授，张海麟同志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本书还汲取了近年来同行若干有关科研成果。谨向这些共同劳动的同志表示衷心谢意。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中国揭开了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1)
第一节 30年代初期的世界,日本,中国	(1)
第二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	(11)
第三节 中国揭开了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序幕	(16)
第四节 风云骤变的1936年.....	(46)
第二章 中国开辟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64)
第一节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64)
第二节 中国全面反法西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 开始	(72)
第三节 上海保卫战与南京陷落	(81)
第四节 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抗日与忻口会战.....	(93)
第五节 敌后战场的开辟	(99)
第六节 徐州会战.....	(106)
第七节 武汉、广州保卫战	(115)
第八节 敌后战场的发展.....	(122)
第九节 中国战场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28)
第十节 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的开辟与国际政治 新格局的形成.....	(133)
第三章 战略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战略防御	(141)
第一节 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与中国反法西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41)
第二节	中国正面战场	(147)
第三节	中国敌后战场	(164)
第四节	中国“四强”之一国际地位的确立与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185)
第五节	中国坚持抗战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193)
第六节	中国抗战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战略防 御	(204)
第七节	中国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转变	(211)
第四章 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及其国际地位		(225)
第一节	战略反攻初期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	(225)
第二节	反攻作战时期的中国正面战场	(228)
第三节	中国敌后战场的反攻作战	(249)
第四节	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作战	(272)
第五节	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概况	(277)
第六节	中国战场反攻作战在大战中的战略地位	(285)
第五章 日本侵略者的战败与投降		(296)
第一节	日本无力再战	(296)
第二节	中国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成员国	(302)
第三节	美国投掷原子弹与苏联参战	(306)
第四节	日本侵略者的求和与投降	(311)

第一章

中国揭开了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第一节 30年代初期的世界、日本、中国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中国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场。但长期以来，国内外许多历史学者却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机械地分割开来，无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无力作出科学的论述。

为了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正确理解中国反法西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联系，完整地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有必要首先对30年代初期的世界、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作一鸟瞰。

30年代初期的世界

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后，战争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如百年战争（1337—1453），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七年战争（1756—1763），特别是拿破仑执政时期（1799—1814）的战争，规模更大，仅法军即达300余万，造成700万人丧生。但当时的生产力尚低，在经济上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性较小，松散的国际社会结构，还不可

能形成世界性问题。上述战争不论其持续多久，规模多大，它们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国与国之间，或几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而不可能涉及世界全局。因此，历来史学家不曾称这些战争为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要解决的问题，不再限于个别阶级、政治集团或局部地区，而是世界性的问题，或者说世界性的矛盾。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越出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狭隘的范围……整个世界已经融合为一个经济机体。”^①的情况下，国际社会里才可能出现世界性的矛盾。世界性的矛盾导致的战争，称之为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争仅有两次，均发生在垄断资本形成后的 20 世纪。研究世界大战，必须首先把握住当时世界性的主要矛盾。

社会是“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动机体。”^②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世界矛盾的各方及其性质决不是一成不变的。1914 年，“世界分成两个帝国主义军事联盟，它们都曾准备和煽动帝国主义战争，它们都在力求建立世界霸权。当时既没有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也没有法西斯独裁的国家”^③。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局面，而且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又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复杂异常，变幻莫测。但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却不难看出，足以影响世界全局者主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法西斯国家与非法西斯国家这两对矛盾。二者相比较，虽然前者也属于世界性的基本矛盾，但并不是引发世界大战的主要危险。这是因为，革命不能输出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而且苏联已经公开宣称：它诚心诚意地希望

① 《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2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68 页。

③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93 页。

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并高兴地走一半路去迎合它们当中的任何国家。1933年11月苏美建交；1934年9月，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同年12月，苏联分别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不会威胁任何国家的安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后者处于主动地位。而法西斯的本质却决定了它与非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剧烈，并逐渐上升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一主要矛盾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再是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争霸战争，而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

当时的世界，既然存在着法西斯国家与非法西斯国家，我们就必须对法西斯有个清醒的认识，把二者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揭穿想要掩饰法西斯国家与非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差别的任何意图”。^①

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在他为《意大利百科全书》所写的《法西斯主义》辞条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有一个概述。他宣称：“法西斯学说的主要支柱是关于国家及其实质、任务和目的的观念”；“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国家之外既没有个人，也没有集团（政党，团体，工会、阶级）”，因此，法西斯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顽固地坚持阶级斗争的历史运动，不愿使各阶级在同一种经济和道德现实中调和起来的国家统一”。“法西斯主义对自由主义学说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因为“自由主义为了特殊的个人利益，对国家抱否定的态度”；“民主制度是一种不立国王，但有许许多多国王的制度，这许许多多国王比起那怕是一个暴君的国王来，有时更不容异见，更暴虐和更有害”。它们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侵略和扩张是国家的职能，它“不相信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和有益性”。墨索里尼妄想把世界法西斯化，他声称：“20世纪是一个极权的世纪，一个

^①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7页。

右派的世纪，一个法西斯的世纪”。^①当然，“依照一定国家在历史、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情况及其民族特点和国际地位，法西斯的发展和法西斯独裁本身是在各个不同国家内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的”^②。但法西斯独裁、侵略的本质并无不同。

怀有这种法西斯信念的德、意、日诸国的政客军阀们，利用各国家当时的国际处境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在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先后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法西斯统治。他们以公开的恐怖独裁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消灭了本国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在对外政策上，他们不仅用战争手段夺取市场和原料产地，更要剥夺他国主权，取消其民族独立，力求把法西斯制度推行于全世界。

这些法西斯主义者在取得政权的同时，开始了进行世界大战的准备。日本已经发动侵华战争。意大利实现了“人人皆兵的军国主义政策”^③；1935 年 10 月 3 日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德国军工生产投资额，逐年增加。1933 年占其国家经济投资总额的 23%，1935 年猛增至 57%；在 1933 至 1935 年间，德国投入生产的军工厂达 300 余家，飞机增产近 10 倍；1935 年 3 月 16 日，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到 1935 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了。

在 30 年代初的世界上，法西斯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时代赋予世界人民的天职是：“时时刻刻抱定明确目标和集中力量去打击法西斯侵略者”^④。任何国家或民族，无论大小或强弱，只要它的斗争矛头指向人类的公敌——法西斯，它的斗争就是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无可争议的。

① 以上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意大利百科全书》第 14 卷，1949 年版，《法西斯辞条》。

②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42 页。

③ 详见罗红波著：《墨索里尼》，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1—171 页。

④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97 页。

30年代初的日本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改造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策划了一系列军事政变,建立了日本型的法西斯统治,终于使日本“成了第一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①。这一切,都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的。

日本原是一个封建小国,到了19世纪后期,发生了“明治维新”(1868—1871),建立了以天皇为专制君主的统一国家。这一政治变革,使得“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本的资本主义“象暴风雨一样急剧地发展起来了”^②。

但是,明治维新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显著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日本资产阶级,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日本资产阶级在明治维新中使用的思想武器,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而是把忠于神化了的天皇作为统一国家的精神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的这种封建因素,构成了武士道精神的核心。

其次,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对外侵略战争是密切结合的。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战后,根据《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③和台湾及其所属诸岛屿(包括澎湖列岛),赔款白银2亿两,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10年后,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日本打败了争夺远东霸权的敌手,迫使俄国把旅大“租借地”以及从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其所属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又过了10年,1914年,日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掠夺了大量赃物。每10年一次的对外战争,在经济上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政治上使充满封

① 德田球一:《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周年》,《光明日报》,1952年7月12日。

② 市井正一:《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8页。

③ 后因列强干涉,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

建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阀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充分信任。于是，二者彼此勾结，互相利用，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日本资本主义是在天皇制国家的扶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日本，工业资本家的主体不是出身于手工业工场主的资产者，而是由天皇制国家直接扶植起来的封建余孽与富商大贾。天皇政府利用侵略战争的赔款和对人民的重税收入作为原始积累，创办各类国营企业，而后将这些国营企业廉价售予在德川时代即已发展起来的商业高利贷者、土地贵族以及国家机关中的权贵。与此同时，天皇政府还采取补贴、贷款、免除捐税等政策，大力扶植私营工矿企业。如此形成并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日本资产阶级，先天地对天皇政府具有极大的依附性。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微不足道。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缺乏自由民主的传统，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能够通过政变取得统治地位的重要因素。

日本资本主义在迅速地发展着，而日本农村却依然处于封建残余的统治下。当时，寄生地主制^① 是日本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态。租佃关系占有很大比重。1926 年，日本佃农和自耕农兼佃农占总农户的 68.8%，租佃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45% 强。经营的规模多为不满 200 日亩的小生产。^② 这样的农业经济不可能给资本主义工业提供足够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处于“最残酷、最无耻”的剥削之下，贫困不堪。这种经济结构和社会状况，决定了日本国内市场非常狭隘，1/3 的产品必须出口外销。此外，日本缺乏工业原料基地，国内没有自己的铁矿，石油、煤藏量也很少，而且煤质低劣。因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对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求特别强烈。它的贪婪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就表现出特殊的侵略狂热。

① 寄生地主制是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地主所有制。佃农和地主之间有租佃关系，而无身分隶属关系。

② 参见野吕荣太郎著：《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176—177 页。百分比是根据该书资料计算出来的。

在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日本受到非常显著的冲击。到 1931 年，日本生产下降到最低点。据统计，工业生产总值比 1929 年下降了 32.9%；对外贸易总额比 1929 年下降了 45%。全国失业工人数超过 300 万。阶级矛盾锐化，政局呈现不稳。为了解脱国内困境，必须把矛盾引向国外。经济危机促进了侵略狂热的恶性发作，日本走向战争的步伐极大地加快了。

1931 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战争，这是远东战争策源地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在此以前，日本的政客们深怕军部的冒险失败而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与日本总的发展不利。及至日本抢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既未受到中国政府的有力抵抗，也未遭到列强的干涉。冒险的成功增强了政客们与军部的合作。

“以侵占满洲为转机，日本的全部经济都被推向军事化的方向”^①。军费开支递增不已，1931 年度占岁出的 30.8%，占国民收入的 5%；到 1936 年度增至 45%，占国民收入的 6.6%。^② 1931—1936 年间日本军费占国家总开支的比例，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随着军费的增加，日本的军事工业和武装力量都有了迅速的发展。1930—1935 年间，日本的武装力量从 25 万人增加到 40 万人。陆军工厂生产总值 1931 年为 4700 万日元，到 1935 年度，增长到 1.2 亿日元，即增长了两倍多。海军工厂也加快了生产步伐，其用款之巨，超过陆军。此外，民办军事工业也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军队的装备有了本质的改进。日本陆军在 1931—1935 年间，共增加了近 600 辆坦克、1070 架飞机、1651 门火炮。同时，日本海军新添了 46 艘军舰，总排水量为 134536 吨^③，并更新和增加了 2000 架新型飞机。

日本经济的军事化，不仅增强了军事实力，而且改变了国内的

①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 卷，第 161 页。

② 马垚、杨尔理：《日本战时经济概况》，1943 版，第 23 页。

③ 《论太平洋战争的结束》1958 年（昭和 33 年）东京版，第 321 页。

政治形势。军事工业使日本旧财阀的利润率从 1931—1936 年激增了两倍到四倍。同时,由于军事工业的需要,还出现了一批新财阀,特别在化学工业及其他军备制造业方面,这批新财阀占有相当大的势力。军部忠实而有效地为新旧财阀效劳,博得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充分信任,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更加协调一致,发动战争的经济、军事、政治条件均已具备。日本已经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

30 年代初的中国

30 年代初期的中国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歷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无暇东顾,虽然日货加紧倾销,但外货输华总值还是有所下降,国货市场乘机扩大,这就有力地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中国民族工业乘帝国主义大战之机而开始繁荣,为时不过数年,基础十分脆弱,大战一停止,外资卷土重来,民族工业立即受阻。如兴隆一时的棉纺织业,其“繁荣景象维持到 1922 年而完全消逝”^①。事实说明,不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中国的国民经济便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随着大战期间工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无产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与斗争的深入,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十月革命的浪潮激荡着全世界,更影响着毗邻的中国。中国人民开始重新考虑祖国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以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桥梁,马列主义传入了中国。通过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完成了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步入了崭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反帝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202 页。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下册,第 1185 页。

反封建的革命纲领^① 以及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策略^②。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受到中国历史的推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沿着“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道路，对中国革命进行着新的探索。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的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使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于世界”^③ 为要义。新民权主义，主张人民民主，“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④。新民生主义原则为二，“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⑤。孙中山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斗争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为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提供了政治基础。

正确的革命纲领的提出与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26年7月，开始了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的“大革命”——北伐战争。虽然由于发生了“四·一二”、“七·一五”事件，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北伐战争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是全国人民却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锻炼。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传遍了全中国，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日本侵略者无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悍然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进而将魔爪伸入关内，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①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宣言指出：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争取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②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于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组织上、政治上确保共产党独立的原则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把它改组成民主同盟，共同进行“国民革命”。

③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5、526页。

④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5、526页。

⑤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5、526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里，社会阶级、阶层的结构是复杂的，它决定了政治思想类型的多样性。但是除了极少数民族败类外，中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那就是爱国主义。“九·一八”之后，由于中国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大片国土沦丧，同胞惨遭杀戮，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救亡图存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呼声。

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国家民族已经陷入空前危机，救亡图存是全民族的共同任务，必须积极发动群众，唤醒民族觉悟，组织力量，武装抗日。1933年1月，日军闯入山海关，开始入侵华北，中国共产党再次发表宣言，愿意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共同抗日。这一宣言，得到部分国民党将领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风起云涌，迅猛发展。他们组织救国会，成立抗日义勇军，要求武装抗日。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适应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一次向全国同胞呼吁：“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的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得到了一切爱国主义者的热烈拥护。以“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为起点，全国开始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各地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妇女、职业团体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政治局面基本形成。日本侵略者再想侵占中国一寸土地，不付出血的代价已经不可能了。

纵观30年代初期的世界，法西斯与非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形成世界性的主要矛盾；东方的法西斯国家——日本，是远东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觉醒了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斗争的主要力量。中日矛盾已经和世界主要矛盾联成一气，“要